

刘秀怎么用人才

□ 路向军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是西汉末年一个没落的远房皇族，公元23年被更始派去招抚河北。他“单车临河北”，仅一年时间便发展为占据黄河以北的全国最强大军事集团，又逐次消灭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统一中国。

刘秀成功的一大关键，就是会用人。毛泽东点评《东观记》时说，汉光武帝刘秀是“历史上最会用人的皇帝”。

表率作用

会用人，先要人愿为所用；要人愿为所用，领导人就须先为表率。

刘秀去河北时既无兵又无地，身边却很快聚集了一个优秀的人才集团，云台二十八将就都是这一时期投奔刘秀的。刘秀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让四方优秀人才竞相投附？

公元22年，春陵—绿林联军在棘阳战败，刘秀单枪匹马逃出，遇到妹妹刘伯姬，“扶其上马，共骑而奔”；逃不多远，又遇到姐姐刘元和她三个女儿，刘秀下马，让姐姐和外甥女上马逃命。公元24年，部将钭期在清阳陷于铜马大军包围，刘秀亲自带兵冲进重围，救出钭期和部下。

历代帝王遇险，很多都是牺牲部下和家人自己逃命，刘秀却几次不顾性命搭救部下和家人。

昆阳大战，时为偏将的刘秀挺身而出，定计坚守求援。他亲率十二骑突出重围，召集来一万散兵，许为更始军主力动摇新莽军心；又亲率敢死队冲入新莽中军，杀死其主帅王寻，取得了以不到两万人歼灭新莽四十二万大军的决定性胜利。

决胜时刻的大智大勇，生死关头舍己救人——刘秀以这些高尚品行树立了表率，使得各方优秀人才纷纷前来投奔。

尊贤尚功不避亲仇

刘秀的用人融合了儒家宗亲、墨家尊贤、法家尚功之道。他的功臣集团中，既有来歙、邓晨、刘隆等宗亲，也有岑彭、赵壹等曾经的敌人，甚至有朱鲋这样不共戴天的仇敌。

刘秀称帝后，麾下人才济济。表



兄来歙以一介白丁前来投奔，一见面刘秀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来歙穿上，封为太中大夫。来歙主动承担经略西方的重任，并非任人唯亲，而是知道来歙是出色的战略家。

当时刘秀正全力平定中原，对西北隗嚣和西南公孙述两大割据势力深以为忧。来歙主动承担经略西方的重任，说动隗嚣归附。三年后隗嚣做乱，来歙又指挥诸将平定了西北。

刘秀任用来歙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宗亲”和“尊贤”，而且遵循了“尚功”原则：初到只授太中大夫的散职；说服隗嚣归附后，提拔为中郎将；隗嚣反叛、来歙出奇兵攻取要地略阳后，才任命为西线的总指挥。

刘秀对仇敌朱鲋的推诚任用，则是用贤不避仇的范例。

朱鲋是绿林军的首领之一，他主谋拥立更始，又主谋杀害刘縯，主张除掉刘秀，是刘秀的仇敌和死对头。

公元25年，朱鲋作为更始军在中原的主将，据守洛阳。刘秀的二十万大军围攻几个月不能攻克。刘秀派大将岑彭去劝降。朱鲋顾虑自己杀害了刘秀的兄长刘縯，又劝更始不放走刘秀。刘秀当即表示：“夫建大事者，不忘小怨。鲋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朱鲋投降后，刘秀封其为扶沟侯、平狄将军，统一天下后任少府。

朱鲋和刘秀故事成为历代招降最常用的典故。但这不仅是一个用高爵厚禄招降仇敌的典故，还体现了刘秀的“亲贤为急”和“推诚不疑”。

朱鲋是绿林军中突出的人才，他

拥立更始，杀害刘縯，主张不放刘秀去河北，都是使本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更始政权普遍腐败的状况下，他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因此刘秀才在打天下时让朱鲋继续带兵；在统一后担任少府要职。

刘秀尊贤尚功不避亲仇，对不共戴天的仇敌都能不存芥蒂推诚信用，使各方人才不但愿为所用，更忠心耿耿地追随。

标杆作用助成统一大业

刘秀善于根据政治需要树立不同的标杆，特别是树立“归附标杆”，助成了统一大业。

新莽时天下大乱，割据势力遍地皆是，包括陇右隗嚣、巴蜀公孙述、睢阳刘永、琅邪张步等大小数十家。刘秀对这些割据势力都是迫之以兵，诱之以利，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他进行政治诱降树立的标杆，除了朱鲋，突出的还有窦融和张遵。

窦融当时割据河西五郡，扼丝绸之路，又与陇右隗嚣、巴蜀公孙述接壤，对几大势力争夺天下举足轻重。

刘秀初定中原后，窦融表示愿意归附。刘秀立即封窦融为凉州牧，仍管辖河西五郡；窦融出兵助讨隗嚣时，刘秀又大表亲近说自己先祖景帝就是窦融先祖窦太后所生，颁给他“外戚图”，封为安丰侯，还把女儿内黄公主嫁给窦融的儿子。

王遵是隗嚣部下大将，刘秀招降后封为向义侯、太中大夫。

刘秀树立这些标杆，极大地加快

了他统一中国的步伐：窦融的归附使河西走廊和平归汉，在平定隗嚣、公孙述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遵的归附使隗嚣部下十三位将军、十六个县相继归降，瓦解了隗嚣割据势力；朱鲋被推诚信用，使占据汝南的刘茂、占据颍川的尹尊等先后归降。

不拘一格用人才

刘秀在建立政权时，依靠的功臣出身各异，有绿林豪杰、贩夫流民、新莽官吏、儒生学者、地方强豪等，刘秀都能量才使用，但做得更成功的是统一天下后的治国用人。

刘秀对待功臣，既不“以斩首之功为匠匠”使处非位，亦不免死狗烹，而是“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如云台二十八将，只选择几人参与朝政或御边征寇，其余各就封国。

刘秀选拔治国人才，既用一部分“清官”，也用一部分“酷吏”。他往往往亲自考察，又不时召集官员、乡老查询，了解基层吏治的得失，以选用贤明干练的人才。

刘秀选用的第五伦、宋均、杜诗、董宣、樊晔、鲍永等，都成为一时名臣。

如第五伦，刘秀统一天下时，他仅是一个基层小吏（淮阳国医工长），很得民心。刘秀听说后两次会见他，破格提拔他做会稽太守。第五伦在任清廉爱民，自己斩豕养马，妻子下厨做饭，节省下的薪俸都救济贫民，又严厉禁绝当地为害的淫祀，将地方治理得非常好。

又如大名鼎鼎的“虎项令”董宣，在地方任职以执法严酷著称。当时洛阳勋贵云集、骄纵不法，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就杀了人，地方官不敢过问。董宣被任命为洛阳令后，首先抓住杀人的湖阳公主家奴就地正法。湖阳公主告御状，刘秀劝她说皇帝更要带头守法，并奖励董宣严格执法。自此洛阳豪强贵戚无不震栗，再不敢有法不依。

刘秀治国外儒内法兼用黄老，选才王道霸道杂用，奠基了“明章之治”。



与翟合谋伐晋。

这些战术动作在一定程度上给晋国带来一些小麻烦，但是在战略层面，秦国没有多少进展。在穆公东进之策中，秦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是消化河西之地，如有余力，占有河东之地，打通涉足中原的通道。桓公在秦国的核心利益上没有实质进展，过多的战术“小动作”却显得冒进，给秦国带了大麻烦。尤其秦国没有遵守与晋国的盟约，既没有获得实利，又落下了诚信污点。

没有实力制定规则，但又要破坏现有规则，往往会给自己造成困局。秦桓公二十五年，晋厉公新立，计划与秦君在令狐会盟。作为晚辈的晋厉公很有诚意，早到会盟地点恭候秦桓公，但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秦桓公却始终不肯渡过黄河与晋厉公当面会晤。于是，秦晋之间举行了一次“无奈”的会盟，秦君特使史黯到河东拜见晋厉公，晋君特使卻鞅到河西拜见秦桓公，隔河相望的会盟丝毫没有增加秦晋之间的信任。在关键节点，秦晋之间错失了改善关系的机会，这对于处于劣势的秦国十分不利。此后，秦桓公很快背弃了与晋国盟约，这成为麻隧之战的直接导火索。

秦桓公所处时代，晋、楚成为天下舞台的主角，秦却未能把握大局。秦楚同盟被削弱，秦晋矛盾又在激化，此消彼长之间，秦渐渐陷于困顿之中。麻隧之战是秦国内外失调的集中反映，秦还要在低潮期徘徊探索数代之久。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 袁和平



《天工开物》锤锚图

华瞻深厚的华夏文明行进到元末明初，大大小小的造船工场遍布全国。当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发生了著名的水上交兵，水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朱元璋获胜建立明王朝后，多次要求后代不可懈于舟师水军建设。

明代著述《南船记》，详细列出了明代二十多种内河战船的用途、建造要求、用材尺寸，并附有图样。如四百科、二百科、一百五十料的战船；桥船、三板船、巡座船、寻沙船、印巡船、哨船、轻捷便利船、楼船、快船、海船等。

明代茅元仪著《武备志》及戚继光著《纪效新书》分别介绍了在抗倭战争中使用过的二十多种海上战船。如福船，大号是戚继光的旗舰和主力战船。遇敌水战时，“福船趁风下压，如车辗蝗螟”。同时规定，福船兵器以火器为主，且火器与冷兵器结合使用。

还有种火龙船，“此船状类海船，四周以生牛革为障，或刻竹为笆，用此二者以挡矢石。上留銃眼、箭窗，用以击贼。上中下分为三层，首尾设暗舱以通上下，中层铺用刀板、钉板。两傍设飞桨或轮，乘风排浪，往来如飞。募4人以为水手，与贼诈败，弃而与之。精兵暗伏下舱，4人赴水而走，待贼登船，机关一转，贼皆翻入中层，刀钉板上。生擒缚缚，懦夫病妇亦可就戮之，况于兵乎。若冲入贼船队的，两傍暗伏火器百千余件，左右冲突，势不可挡”。

还有一种封舟。它是明代使臣出海时的座船，多在东南沿海建造。陈侃的《使琉球录》说一艘封舟需耗2500两白银。徐葆光著《中山传信录》称，封舟长17丈，宽3.16丈，深1.33丈。最大的封舟长20丈，宽6丈。最早的封舟只有23舱后发展至28舱。

至于明代永乐年间郑和的七下西洋，史志记载，每次均有大船几十艘，将士船工近3万余人。其最大的宝船长444丈，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这些都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发展 to 鼎盛时期的结晶，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能够长久支撑郑和七下西洋的，应该是明代强盛的国力和发达的舰船制造业。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明代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同时，“七下西洋”本身就是华夏先祖一个重要的历史传承与事业接续的过程。

据考古发现，在河南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物中，竟然有来自现今马来西亚海域的硕大海龟甲。专家们由此推测，这些产自现今马来西亚海域的海龟甲能够不远万里来到中原商都，而且又有如此可观的数量，说明早在殷商时期，东亚内陆腹地与现今的马六甲地域就已经有着非常密切的海上联系了。史籍记载，大约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代先贤就尝试着“蹈海”“下西洋”；最迟也不会晚过唐代，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开辟。为了保护海上商贸的正常进行，中国政府一般都派有水军随航。现存的大量史料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命名南沙群岛的国家，也是历史上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理管辖权的国家。

上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有个叫杨孚的人写了一本《异物志》。书中记载南沙群岛“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这是世界各国目前所能穷尽的史料中对南沙的最早记载。

到了三国时期，东吴将领康泰在《扶南传》中不仅提到了南沙群岛，而且对诸岛形状地势做出了描

述。至于康泰本人是否亲自率舰船到过南沙，无从考证，但他总不会凭空想象出南沙诸岛的形状地势，至少也是他手下的亲随到过南沙诸岛。

时间的长河流淌到了宋元，宋人把南沙、南海直接称为“千里石塘”“万里长沙”。存于《元史·地理志》《元代疆域图序》记载中的元代疆域均鲜亮地标明出“南沙群岛”，《元史》中更是记载了元朝海军巡查南沙群岛的历史事件。

因此，我们要看到，承继蒙元王朝对中国疆域统治的朱明王朝，能够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就派遣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绝对不是偶然的。没有上千年来的历史积淀，郑和能够贸然前往未知海域吗？历史告诉人们，到了明代前期和中期，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更是居于世界前列。宋朝前期发明的指南针已普遍应用于航海，明初还发明了著名的“牵星过海术”等海上导航方法。这些都为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的壮举奠定了基础。

从科技层面上看，郑和的远洋大型海船，总体上具备了三大技术优点：一是舰艏首端尖如楔，底部削如刀，在深海中破浪航行，阻力较小；二是船体普遍设有艍龙骨以减少风浪中的摇摆，两舷还有几道纵通的木枋以增加纵向结构强度；三是设置多道水密隔舱，提高了战船的抗沉性等等。这些领先于当时世界的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在现代舰船的建造中寻觅到它们的踪影。

至于它的巨大，人们可以从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领略。看看“锤锚图”上那巨大的铁锚形象，就可以想见当年中国人掌握的技术优势，是如何强力地支撑着明朝初年这支“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涛，若履通衢”的强大舰队去远航西洋的。

郑和远航采用的各式战舰多达百余艘，舰上官兵达2.7万余人。其中有张挂12张巨帆、由指挥官乘坐的主力战舰宝船；有装备大发贡10门、大佛朗机40座、碗口銃50个以及大量喷筒、鸟銃、火箭、火砖的战船；有主要搭载两栖部队的坐船；有用来运送马匹、物资的马船；还有运送粮食、淡水的粮船和水船，等等。该船队的规模、舰船吨位、航海技术和海上作战能力，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堪称一流的。



□ 崔 庆

穆公、康公之后，秦国发展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秦晋关系不断恶化，终于爆发了麻隧之战。这不仅是一场战役失败，也意味着秦国整体外交战略陷入了困顿状态。

秦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78年），晋厉公派遣晋军精锐，联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周王室的刘康公、成肃公也参加，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多国联军，兵力达12万。战前，晋国还特意派遣大臣吕相入秦，宣读“绝秦书”，历数秦国“罪状”，相当于公开发布讨秦檄文。虽是一面之词，但晋国做足了宣传攻势，取得道义制高点。秦军被迫应战，兵力不到联军的一半。联军深入到秦国腹地麻隧（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军。麻隧之战沉重打击了低迷中的秦国，秦桓公甚至于次年去世。

秦晋消长

秦桓公往往被称为秦国中衰的始作俑者，但桓公绝非一无是处、甘于落后挨打之辈。穆公之后，尤其是桓公、景公、哀公时代，秦国经历痛苦的蜕变期。秦本西陲小国，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之邦，其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原地区，这个时期秦国奴隶制社会正走向没落。先破未立，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反映在外就是国力衰退。秦桓公四年、十一年，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守，

秦国屡屡败给晋国。

晋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作爰田”“作州兵”，经济、军事改革同步推进，在几代有为国君的领导下，国力军力不断增强。秦桓公十六年（公元前589年），晋国在鞏之战中大败齐国。次年，晋国又和卫国联合，消灭了最后的赤狄部落。此时，晋国国力空前鼎盛，原来的三军六卿，正式扩充为六军十二卿，大有傲视天下群雄之势。

除了强大的实力，晋国还有敏锐的战略眼光，意识到秦康公时代形成的秦楚联盟极具威胁。秦桓公中期，楚庄王去世，楚共王继位。秦桓公二十年（公元前585年），楚国重臣申公巫臣叛逃晋国，“楚才晋用”，为晋国联络吴国，形成了晋吴同盟，对秦楚同盟形成了极大的牵制。申公巫臣还成为吴国的特别军事顾问，传授先进的作战方法，使吴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劲旅，极大地牵制楚国，使其难以有余力北上与晋国相争。

格局之变

公元前582年，晋景公身体不佳，秦国名医缓判断其“病入膏肓”，但是晋景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战略头脑，他决定推动晋楚和解，解决晋国的后顾之忧。晋景公主动向楚国示好，释放楚国的战俘，晋楚的战略需求找到了契合点。面对崛起的吴国，楚共王乐于和晋国达成和解，派公子辰出使晋国，修复晋楚关系。晋

景公病故后，晋厉公仍然奉行亲楚政策。

公元前579年，在宋国大夫华元的安排下，晋国与楚国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达成协议，停止敌对状态。会盟约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安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晋楚暂时结束了敌对状态，握手言欢。同年，晋大夫卻至出访楚国，楚大夫公子罢出访晋国，两国关系在高层互动中迅速升温。

晋楚两强相争多年，虽然和平局面并不稳定，仅仅数年之后，晋楚就再次爆发鄢陵之战，但是短暂的平静给晋楚两国都提供了宝贵的休整期。这对于晋楚两国来说是好事，但是对于秦国来说，就是一个麻烦了。楚国可以腾出手来收拾吴国，而晋国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对付秦国了。

道义之失

秦桓公是一位勤奋的君主，在晋国极力拉拢楚国的时候，桓公并没有坐吃山空，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同盟者，争取新的战略平衡。

桓公继位之初，白狄是晋国的盟友，秦桓公四年（公元前601年），晋联合鲁国、白狄，共同进攻秦国。经过桓公不懈的努力，秦国和晋国北部戎狄加强了合作关系，并多次合击晋国。秦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82年），秦国和白狄共同伐晋；秦桓公二十五年，秦晋令狐会盟之后，秦国